

## 民族之声

# 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

□李鸿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高屋建瓴,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深邃的历史感和高度的前瞻性,对我国各民族作家总结历史经验、贴近现实生活、正确面向未来、不断提升爱国主义书写水平、更有力地推动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际上,爱国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光荣传统,不同的作家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展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20世纪初叶,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影响,积极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接着有不少参加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不少人面对国内外敌人滴血的屠刀,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荣禄先(蒙古族)、龙大道(侗族)、邓恩铭(水族)、赵世炎(土家族)、马骏(回族)、郭隆真(回族)、刘清扬(回族)、施澧(白族)、张伯简(白族)、韦拔群(壮族)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革命前辈,他们大量的诗词、文章、演讲乃至誓言,都堪称爱国主义文学的辉煌篇章,其中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例如,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马骏带领学

生发出怒吼:“誓保祖国!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这不是文学,又最是文学,因为它是胆识、血性、生命的熔铸。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1931年就义前在狱中写给母亲这样一封家书:“卅一年华转瞬,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还有1932年在上海龙华与诗人殷夫等一同就义的龙大道的诗:“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产东方出太阳。”这样有骨气有底气的诗文,让人不禁联想到鲁迅评价殷夫诗的名言:“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爱,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白莽作〈孩儿塔〉序》)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写出了一批富有爱国情怀的文学作品。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中有大量经典之作,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抗战精神“是冒着敌人的炮火用鲜血筑起的长城”,“是无数活着的和逝去的战士与烈士们共同谱写的英雄乐章,是我们的永远的支撑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的确,在14年抗战中,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认识有关作家作品的一把钥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东北各族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敌我力量悬殊的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企图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全体总动员,进行全面抗战。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丰碑,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中国各民族作家抗战14年间满怀爱国情怀的书写,也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比如,“东北抗日作家群”的作家们,不论是流亡者还是留守者,都有不同寻常的业绩。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作家,如满族作家李辉英、舒群、金剑啸、马加、端木蕻良等,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李辉英说:“我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慨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旋踵间,又失去了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国土和三十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下而执笔为文的。”(李双庆:《李辉英先生谈生活与创作经验》)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流亡,1932年在丁玲主编的《北斗》上发表以东北为背景的抗日题材小说《最后一课》,此后一发不可收,写了不少以抗日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茅盾当年曾在“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中,对李其长篇小说《万宝山》的得失进行分析,认为小说选取“涉及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作为表现的内容,就决定了它的历史意义”。舒群“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投身抗日义勇军,1932年参加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1935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6年发表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受到周扬、周立波的高度评价。作品以东北沦陷区为背景,叙述了中、苏、朝三个孩子的故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真挚的国际主义情谊。

八年全面抗战中,神州大地东西南北都燃起抗战的怒火,抗日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也是多数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第一关键词。“七·七”事变后不久,满族作家老舍便离开已沦陷的北平,辗转到了武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事宜。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举为总务组组长,成为协会的总负责人。在担任繁重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老舍不遗余力,8年内接连创作了9部戏剧,为中国各民族作家以笔作枪投身抗日救国作出了光辉榜样。他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四世同堂》,反映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突出表现了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全面抗战期间,不论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还是在沦陷区,也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中国各民族作家都经受了严酷的战争洗礼,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作家群体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自称“苗蛮子”又心仪“永恒不变之美”的沈从文,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同样不乏家国情怀,在不少作品中流露出疆场杀敌的豪气。例如,《昆明冬景》中就借人物对话,说出“我去打仗,保卫武汉三镇”的话语。蒙古族作家萧乾对“二战”欧洲战场的报道意义重大,他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如《梦之谷》《湘阴道上》《由香港到宝安》《刘粹刚之死》《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也是不可多得的抗战文学佳作。其中,散文《刘粹刚之死》叙述中国空军第五大队二十四队队长刘粹刚壮烈牺牲之前的事迹,其中有他生前与25岁的妻子许希麟往来的两封书信。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云南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筑筑从云南到缅甸的道路支援抗日战争的故事,写的是普通百姓,可故事感人撼地。

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认同感空前增强,各族人民群众支持抗战,众志成城。《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欲灭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誓死抗战,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誓言。慰问书本身也是抗战文学遗存,声情并茂,字字有金石声和刀枪搏击声。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抗日

英雄,也出现了许多拿笔作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少数民族文学精英。李乔(彝族)、万里云(壮族)、陆地(壮族)、潘万霖(侗族)、苗延秀(侗族)、郭基南(锡伯族)、李寒谷(纳西族)、马子华(白族)、张子斋(白族)、乌·辛(赫哲族)等等。从族别看,满、回、蒙、维作家较多,除上文列举诸作家外,满族还有颜一烟、胡可、关沐南,回族有沙蕾、马宗融、沙陆墟、李超、胡奇、穆青、白平阶,蒙古族还有纳·赛音朝克图、齐燕铭、牛汉、云照光,维吾尔族还有赛福鼎、包尔汉、尼米希依提、祖农·哈迪尔、黎·穆塔里甫等。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有深刻复杂的原因,但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爱国主义者需要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根本联系。

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因为家庭出身、民族归属、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人生经历、创作经验和文学个性不同,所以创作差异必然存在,但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很多人还因为用文学表达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己的理想愿望,牺牲了宝贵生命。维吾尔族作家黎·穆塔里甫就是其中的一个。穆塔里甫1922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中学未毕业就开始写诗,19岁就创作了著名诗篇《中国》。他的创作生涯和八年抗战正好重叠。他的诗作《给岁月的答复》《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五月——战斗之月》《当突破黑暗,留下足迹的时候》《伟大的祖国》《爱与恨》《幻想的追求》、剧本《奇曼古丽》《战斗的姑娘》《暴风雨后的太阳》《青牡丹》和散文《在残废的恐怖中》《“皇军”的苦闷》等,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诗歌在他创作中占主导地位,诗人萧三曾把他称为“天才诗人”,并说“他的诗在我国多民族的诗画里是一朵放着异彩的花”。然而,这位“天才诗人”却因为书写爱国主义精神,1945年9月18日被反动力量血腥地杀害了,年仅23岁。这是中国多民族诗坛也是中华民族的损失。穆塔里甫的诗作《中国》曾满怀激情地呼唤黎明,呼唤新中国,憎恨万分地称日本侵略者为“乌鸦”,激励中国各族人民投入拯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赞扬爱国志士和游击队员的英雄壮举,吁请中国各族人民“在世界上建立惟一的、崭新的、独立的‘新中国’”,“竖起永远飘扬的、千秋不倒的旗帜”,这也是当时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对爱国主义情怀的抒写,到今天依然很昌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爱国情怀的表达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作家们以崭新的视角来对此加以把握。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新视野

## 话说水族

千年沧桑

叶梅

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水族是生活在云贵高原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总共有40多万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地处月亮山、雷公山腹地的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这一带绵绵山岭,溪流交错,间夹着起伏的丘陵和平坝,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过去显然是一个山多人稀的蛮荒之地,但水族自宋代以来从广西迁徙至此,继而与当地的汉、布依、苗、瑶等民族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得以生生不息。

水族自称“睢(sui)”,因发祥于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间有“饮睢水,成睢人”之说。水族跟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徙,据专家学者考证,水族先民秦代时从中原往南,融入百越族群之中,但同时保留延续着殷商文化,创造出水书、水历、水语和钱币等。唐代时期有较大发展,朝廷曾在今广西环江地区设置抚水州,族称由民间的“睢”变更为正史的“水”。宋代早年,龙汉遣使使龙光进奉“西南诸蛮”进京“贡方物”,宋太宗亲自召见,水族艺人当场演奏芦笙舞“水曲”,宋太宗甚为欢喜,“遂以曲以名其族”,后人将此段故事镌刻于墓壁,成为永久历史。

历史总是悲喜交集的,对于水族人来说也是如此。到了宋仁宗时期,南方的少数民族命运多舛,朝廷对外软弱,对内欺压,官员贪贿横行,当时居住在广西宜州西北面环州等地的睢民祖先和其他百越族群,被视为



话说水族 千年沧桑

“蛮夷”“獠蛮”,无端遭受歧视和蹂躏,民不聊生。当年的水语难民歌流传至今:“思恩的人们日夜藏深山,田地不能耕,生意不能做,常年遭受官兵迫害,生不如死……想要命我们就走,逃离此地我们的生活会好得多啊!”在无法再积压的哀伤与愤怒之下,水民们一挙起义,杀县官夺县印,轰轰烈烈,但终因大军镇压和诱骗而失败。在遭到惨烈的捕杀之后,水民一夜之间举族大逃亡。

那是千年的伤痛。如今,美丽的都柳江从三都县境内流向广西,是西南省区南下出海的重要通道之一,也被视为桂林—贵阳—昆明达樟江国家级喀斯特森林保护区旅游线路上最便捷的通道。回望千年,水族的先民们正是从那条古道溯江而上,才来到了云贵高原的山林里。他们带着伤痕隐姓埋名,常年匿迹于深山老林里,后来渐渐散居樟江、都柳江上游,贵州三都一带成为水族先民逃亡的最后归宿地。

时光将这一切埋藏,直到他们的后人,一位水族的书写者潘国会,倾注他多年的心血,写就31万字的长篇小说《千年沧桑》,使千年之前的悲壮得以再现。

潘国会,笔名潘会,是出生于三都的水族人,少则爱好文学,多年笔耕不辍。2009年春,他受《民族文学》之邀来到京城参加“全国55个少数民族作家改稿班”,下半年又进入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学习,这届学员因来自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仅一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有名的“鲁十二”。他们在京城学习期间,曾多次参加一些重要文学活动,受益匪浅。在“鲁十二”的结业典礼上,刘云山同志出席并讲话:“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的组合体,在座的各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大家肩上的重担是把本民族历史文化挖掘出来,以文学形式传承于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

是中华文化之一,缺一不可……”潘国会与他的同学们都深受鼓舞,他决心下功夫深入开掘,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水族历史小说。

但久经战乱和颠沛流离的水族,没有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所经历的大事件,只以有限的口口相传,甚至一些隐晦的民族习俗,来纪念逝去的岁月。要真实地再现民族历史,对于潘国会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他启动了多年的积累及资料搜集,并从2012年以来,开始了艰苦的实地探查寻访,曾先后去到广西的宜州、环江、大化、南丹、天峨、融水、桂林,又在贵州的荔波、都匀、独山、丹寨、榕江、从江等地多次调查。春去冬来,潘国会行走在祖先的足迹里,时而兴奋时而悲伤,劳心劳力,曾因此而病倒在床,但锲而不舍,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终于在羊年岁末之时,完成了书稿。《千年沧桑》反映了公元11世纪初、中叶宋朝时期的社会形态以及水



近日,在广西融水县安太乡整朵村举行的坡会上,小桑村的水族小朋友欢快地吹起了芦笙。

整朵是安太乡一个普通的苗族村寨,从现行建制来看,它只是元宝村的一个自然屯。历史上,它却是安太地区历史上有名的苗族重要村寨之一。活动期间,屯里四处拉起了彩条、彩旗,欢迎标语张贴于吊脚楼柱子和墙板上,鲜亮醒目。宰牛羊,邀朋请友,节日气氛“苗味”十足。四乡八寨各族同胞会聚整朵坡,开展祭祀先祖、芦笙踩堂和斗鸟等活动,祈盼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参加表演的青年男女们不时向观众抛撒糖果,表达他们心中的喜悦,芦笙坡上热热闹闹此起彼伏。(龙涛摄)